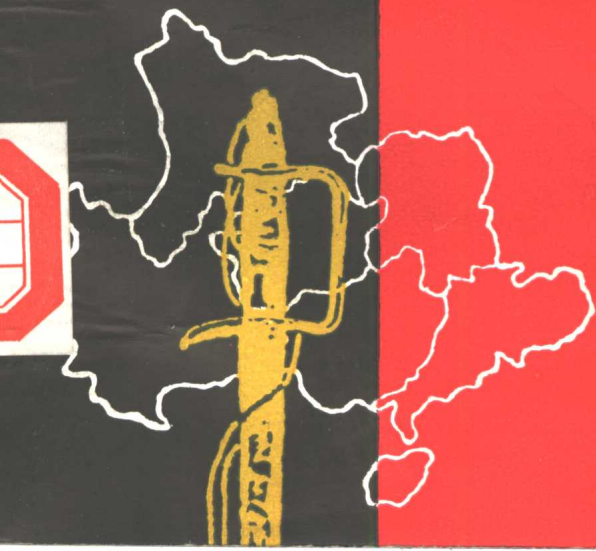


谢本书 冯祖贻 主编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西南军史

(第一卷)



本卷主编：顾大全 高光汉 孙代兴

22156  
818  
1-1

# 西南军阀史

(第一卷)

谢本书 冯祖貽 主编

贵州  
人民  
\* 版

# 西南军阀史

## 第一卷

本卷主编 顾大全 高光汉 孙代兴

### 分 纂

(按姓氏笔划)

冯祖贻 孙代兴 范同寿 荆德新  
顾大全 高光汉 谢本书 熊宗仁

责任编辑 曹维琼

封面设计 王才禹

## 西南军阀史

谢本书 冯祖贻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350千字 7插图

印数 1—3,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2102-3/K·79 定价：6.80元

# 前 言

近年来，作为中华民国史组成部分的西南军阀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出版了部分专著、丛刊、回忆录和资料集，发表了较多的论文。这不仅为开拓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逐渐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自然，由于我们对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研究的深度还有限，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的。这里，先就我们在编写《西南军阀史》过程中，碰到的几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某些探讨和论述。

## 一、西南军阀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

有人认为，西南军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广东、湖南就不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广西也难以完全算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范围。这种用地球上经纬度为尺度的“地理概念”，来确定政治概念范围的做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固然，西南军阀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与这些军阀所在省区处于中国的西南方或靠近西南方直接相关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西南军阀这个概念，主要不是“地理概念”，更不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地区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sup>①</sup>。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经过“二次革命”，北洋军阀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

<sup>①</sup>即使是广东、广西地区，有时也可统称为西南地区。例如，在1936年6月发生的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就曾组织西南联军，以抗日为名，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毛泽东同志就称这次事变为“西南问题”。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实际上统治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袁世凯1916年6月6日死去以后，反袁护国战争不了了之，这时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北洋军阀的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完全达到的各省区，主要是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六省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军阀由于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而所在省区又基本上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因而历史上称为西南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有时又笼统地称为北方军阀）。西南军阀在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这样又使这六个省区大体上分为两类地区，滇系军阀唐继尧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力图向四川扩张，桂系军阀陆荣廷控制广西、广东两省，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也就是说，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出现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两个最大的军阀派别。西南军阀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特指民国初年出现的与北洋军阀相对而言的西南六省的地方军阀集团。换句话说，西南军阀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不是按“地理概念”来划分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使用的。西南军阀是一个历史名词，它不是指任何历史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地方军阀，而是指民国初年形成的与北洋军阀相区别的西南地方军阀集团。后来，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中国时期，西南地区虽然表面上统一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西南地方势力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西南军阀的称号被延续了下来。可见，单纯地用现代中国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的“地理概念”去解释历史上的西南军阀，是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观念的。

有人还认为，西南军阀并非一个独立的完整的集团，他们内部派系林立，既无“团体”之称，又无统一机关可言。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么就只有川系、滇系、黔系、桂系、粤系、湘系军

阀，并无共同的西南军阀，这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实以北洋军阀而论，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的，除了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以外，亦还有许多小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有北洋“团体”之说，有共同的祖宗袁世凯，这是与西南军阀不相同的地方。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西南军阀这个集团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川系还是滇系，桂系还是粤系，都没有自称为“西南系”或“西南军阀”。但是，应当承认，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下，西南各省军阀与北洋军阀在对待若干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当然也有共同点），因而人们把它们看作是区别于北洋军阀的另一军阀集团，不仅是理解的，而且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把西南各省军阀作为一种类型的军阀加以研究，也是必要的。因此，“西南军阀”之说是应该而且能够成立的。

## 二、重要的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性

一个老问题常常使人忧虑。研究军阀史这个课题，到底有什么价值？不断有人提出这类问题。西南军阀史研究学会虽然成立已经10年了，并且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好心的人们却总是希望把学会的名字变一变，最好是不使用“军阀”二字。更有趣的是，一次军阀史学会开会，竟然为附近的群众误认为一批被特赦的军阀在开会，这使人啼笑皆非。

历史研究课题的确定，当然不能说是不重要的。然而，历史研究不能排斥革命对立面的课题，否则“革命”本身的研究也难以继续。民国时代的军阀，总的说来，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与本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压迫者，剥削者与统治者。然而，他们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掌权者、对一省、数省以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起着重大的影响。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他们在历史研究

中的地位。研究正面人物的历史是必要的，研究反面人物的历史也不能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马克思就曾经研究过若干反面人物和反动事件，给后人以重要启示。例如，1848年发表的《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51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列宁不是曾把“帝国主义”作为研究对象而写出众所周知的名著吗？可见，历史研究课题的确定是重要的，而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性则更为重要。

我们研究军阀史应该明确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认真探讨军阀的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及其规律，而不能只停留在为若干军阀头子续家谱、树碑立传的水平上。西南军阀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是研究中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斗争史，同时也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西南军阀史研究的目的性，可以再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毛泽东同志早在1941年就曾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sup>①</sup>。西南军阀史既涉及经济史、文化史，更涉及政治史、军事史，它是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一个方面。

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近代军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要进行革命，就要研究革命的对象；要总结革命的经验，也应当从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进行总结。总的来说，西南军阀是西南方面的反革命势力。他们是怎

<sup>①</sup>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803页。



样勾结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鱼肉人民的？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三，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但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初，孙中山曾希望依靠西南军阀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然而以滇、桂系为主的西南各派地方军阀，表面上应付孙中山，实际上还是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实力，并且几次给孙中山的革命斗争造成严重的挫折。孙中山在失望之余，看到了西南军阀的本质，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sup>①</sup>。这对孙中山晚年的政治转变，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研究西南军阀史有助于认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历程。

第四，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sup>②</sup>。我们知道，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个主要派系，即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皖系和奉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直系。而以滇、桂系为主体的西南军阀，其后台主要是英、美帝国主义，同时也与法、日帝国主义有关。各派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争夺。因此，研究西南军阀史，有助于揭示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

第五，中华民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身就是一部新旧军阀史。离开了军阀史的研究，中华民国史就难以下笔。可见，西南

<sup>①</sup>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7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②</sup>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军阀史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三、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

西南军阀形成于何时，又以什么为标志？学术界意见也不一致。我们认为，从辛亥到护国（1911—1916）是西南军阀酝酿时期，护国战争以后，以滇、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得以正式形成。

“滇系”、“桂系”的名称，出现于护国战争之后<sup>①</sup>，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而1917年爆发的川滇黔成都巷战，即“刘罗”（刘存厚、罗佩金）之战，“刘戴”（刘存厚、戴戡）之战，则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我们知道，民国初年在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及其混战的原因，根本的有两条，一条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入侵及其在华的矛盾，一条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半封建的农业国。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产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sup>②</sup>

这种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出现于护国战争以后，更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首先，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失去了共同的走狗。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华的侵略，划分势力范围，决定了他们要寻找各自的走狗，作为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其次，北洋军阀失去了总头子袁世凯以后，北洋军阀内部各集团在不同的主子（帝国主义）支持下，因争权夺利，扩张地盘，必然分裂成若干派系。再次，在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中央政权摇摇欲坠，各地对北京政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离心力；而“首义之区”的军事首脑们也因权力增大而膨胀了野心，企图利用护国的声威，以图攫取更多更大的地盘和权利。袁世凯死后，各省区军事头目进一步强化了对北京政权的离心力，各自拥军盘据一方，从而形成

<sup>①</sup>黄绍竑：《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5页。

<sup>②</sup>《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8页。

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派系。最后，护国战争虽然推翻了“洪宪”皇帝，打倒了北洋军阀的总头子袁世凯，却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瓦解产生军阀割据的社会条件。

西南地区的四川，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及其附庸黔系军阀刘显世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滇、黔系向四川的扩张，遇到了川系的反抗，相互争权夺利，结果原来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黔川三省军队互相残杀，发生了“刘罗”、“刘戴”之战。

“刘罗”之战是从所谓“收束军队”引起的。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担任了四川督军。然而，不久蔡锷即因病离川，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滇系将领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黔系将领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在川的滇军有两个师，在川的黔军有一个混成旅。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川境，而且还继续增兵，大批滇人又出任川省各级地方官吏，这就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

1917年4月18日，罗佩金率领的滇军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成都北门、通惠门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于是“刘罗”成都巷战爆发。这次战争双方都以争权夺利为目的，而不惜以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为代价。4月19日，滇军派兵烧毁“皇城”周围民房数百家，声言“亮城”，并且阻止警察前往救火。刘存厚为诬罪滇军，亦派兵数百人，伪装滇军，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燃烧到4月22日。这次成都巷战的烧杀抢掠，“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sup>①</sup>。由于成都绅商、外国领事和北京政府出面调停，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滇军由东门撤出成都，次日刘存厚也率川军由西门退出成都，“刘罗”战争逐渐停顿下来。据统计，这次战争，仅百姓伤亡即在3000人以上，财产损失达47万余元，烧毁民房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

<sup>①</sup> 《东城碧血录》，见黄绶：《罗戴祸川纪实》副册。

“刘罗”战争结束不到三个月，“刘戴”战争又爆发了。1917年7月5日晚，戴戡命令熊其勋旅向北较场刘存厚的军部等地发动进攻。刘存厚早有准备，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沿途焚烧民房，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①”

“刘戴”战争几乎是“刘罗”战争的翻版。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将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交省议会，于7月17日率领黔军从南门退出成都，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附近，遭到刘存厚的腰击，熊其勋被川军所俘，后被斩首，戴戡亦同时为川军所害（一说为自杀）。“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这次战争，仅据红十字会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364人，伤者661人；市民死者110人，伤者310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胜利，而北京政府却派长江上游巡阅使、北洋系的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北军入川。到了此时，人们看清楚了，原来段祺瑞政府是要利用南方的矛盾，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川、滇两军又在川南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它们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追击，要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而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心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这两次战争又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17年川滇黔两次巷战及其在川南的战争，是典型的军阀混战性质的战争。我们可以从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以及客观效果等几方面来论证这一问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从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

---

①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不外乎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们，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已。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显世为代表的黔军跟随唐继尧之后也要向四川扩张，而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换句话说，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和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三方来说都是违背民心的、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当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继续留川就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动，唐继尧也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绝。①”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时期，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焚烧抢劫，无所不为。成都巷战，使人触目惊心。随后的川南战争更是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夫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病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②”古宋乃是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并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①唐继尧在李烈钧电报（1917年12月15日）上的批语，未刊资料。

②四川《古宋县志》卷9，第22页。

最后，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日益深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你争我夺，未有已时，“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混战局面不断地延续下去，使人民遭受更大的痛苦。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几点。第一 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某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滇军援川，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情况。第三，因此，我们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即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sup>①</sup>“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和评论，是很值得注意的。

#### 四、西南军阀史的分期

在探讨了西南军阀的形成以后，那么又怎样对西南军阀史进行分期呢？这里不仅涉及到西南军阀史的上限，也牵涉到西南军阀史的下限，还牵涉到西南军阀在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在西南军阀史的几次学术讨论会上，意见比较分歧。参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南军阀的酝酿时期（1911～1916）

以滇、桂系为代表的西南军阀，其酝酿和形成的背景都可以

---

<sup>①</sup>李根源：《书丁巳川事》（1917年），《尚石文录》卷2，1932年版第22页。

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不过从辛亥革命起，经过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滇桂系都还不能看作是独立的地方军阀。不管唐继尧、陆荣廷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良好的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因此，在护国战争以前，很难说西南军阀已经形成，最多只能说它们在酝酿形成的过程之中，但他们在护国战争末期及其以后，利用了反袁的护国声威，把势力扩大到邻省，从而形成独立的地方军阀势力，唐继尧、陆荣廷也俨然以土皇帝自居。川、黔、粤、湘系地方军阀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形成。

### 第二阶段，西南军阀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期（1916～1927）

从护国战争末期到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北洋军阀垮台为止，是西南军阀从形成到发展的阶段，这是西南军阀的鼎盛时期，也是西南军阀史研究的主要阶段。当然，西南军阀各派系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在1920年以前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是到1921年，其实力遭到严重打击，到1925年其残部也被消灭。这样，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就逐渐地为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所代替。新桂系后来加入了国民党新军阀集团，但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仍然保留有地方军阀的若干特征。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1927年以前一直相当活跃。唐继尧不仅自称“东大陆主人”，还曾有五省、八省联军总司令的头衔，号称“联帅”。虽然在1921年一度被他的部下顾品珍赶走，但第二年又重返云南，打死了顾品珍，再次掌握了云南大权。直到1927年初，唐继尧又被部下胡若愚、龙云威逼去职，不久病死。然而滇系军阀并未因此垮台，后继者又继承了唐继尧的衣钵，继续在云南当土皇帝。

广东、四川、贵州，在这一时期派系林立，战乱频繁。到

1926年，旧粤系军阀基本上消灭，川、黔系军阀则仍处于混战状态之中。

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湘北岳州一带主要控制在北方军阀的手里，湘南主要控制在南方军阀的手里。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湘系军阀逐渐丧失独立的地方军阀的特征，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新军阀集团。

### 第三个阶段，西南军阀的继续时期（1927～1937）

1927年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建立了表面统一的蒋家王朝，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这以后，作为与北洋军阀相对而言的西南军阀，则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湖南、广东基本上纳入了蒋家王朝直接的统治范围。滇、桂、川、黔虽然名义上统一于蒋家王朝，实际上仍处于半自主的状态。不管是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或者是贵州的周西成、王家烈，大体上仍然保留着土皇帝的特色，或者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象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sup>①</sup>因此1927年以后，还可以把西南地区看作是西南军阀统治的继续，不过是以新军阀的面貌出现罢了。

### 第四个阶段，西南军阀的尾声（1937～1949）

抗日战争前夕，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1935年初，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云南，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贵、川地区。同年，蒋介石派顾祝同、薛岳以突然袭击方式，夺取了贵州军政大权，黔系地方军阀覆灭。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中央军大批涌入四川、云南，并迁都重庆，四川军政大权事实上落入蒋家王朝手中，川系刘文辉、邓锡侯虽然还

<sup>①</sup>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页。



保留了部分地盘，但也大大失去了独立性。相对地说，在云南的龙云，还较多地显示了独立的特色。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趁滇军大批派往越南受降的机会，指使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企图一举覆灭滇系的统治，但卢汉又继承了龙云的衣钵，继续滇系的统治。不过，卢汉统治云南时期，作为独立的地方势力的特色也越来越淡薄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举挺进西南，卢汉在云南，刘文辉、邓锡侯在西康、四川宣布起义，西南各派系的残余势力最后倒向人民一边，从而宣告了西南军阀历史命运的最后结束<sup>①</sup>。

这样的分期使我们看到，研究西南军阀史最主要的阶段是1916年~1927年这一段，其次是1927年~1937年这一段，而它的背景（1911年~1916年）及其尾声（1937年~1949年）两段，实际上缺乏独立性，因而不是西南军阀史研究的重点。

## 五、西南军阀与新旧军阀的比较

研究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的比较，实际上是要说明西南军阀作为独立一派军阀的自身的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来说明。

首先比较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两者的共同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南北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的一致性。封建的、分散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军阀豪绅割据的土壤；而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互相争夺在华权益，物色各自的走狗，造成了军阀豪绅割据的条件。这就是说，南北军阀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性发展的结果，

---

<sup>①</sup>1937年以后，西南军阀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已演化为地方实力派，可称之为“西南地方实力派”。关于地方实力派的问题，我们将在《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加以论述，这里不再赘述。